



中央党校大讲堂

陈雪薇讲稿

ZHONGYANGDANGXIAODAJIANGTANG

实事求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央党校大讲堂

陈雪薇讲稿

ZHONGYANGDANGXIAODAJIANGTANG

实事求是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雪薇讲稿/陈雪薇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 10

(中央党校大讲堂系列)

ISBN 978-7-5035-5162-8

I. 陈… II. 陈…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6999 号

陈雪薇讲稿

责任编辑 曲 炜 王 琪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明明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24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定 价 7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历经 80 年的风雨，中央党校作为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培养党的理论队伍，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阵地和干部加强党性锻炼的熔炉，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党校的教师们以他们独特的学术视角、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紧跟时代发展的观念意识，在讲堂上传播智慧，启迪思想，其中一些教师还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过讲解，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和授课经验是十分难得的珍贵教学研究资料。

因此，我们选取了在中央党校有代表性的教授，将他们的讲稿进行精选和编辑整理，形成《中央党校大讲台》丛书。丛书中收录了各位中央党校著名教师为中央党校各班次学员、地方党校学员以及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培训授课的讲稿。这些讲稿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央党校的教学风貌，反映了中央党校教学的高度，也体现了中央党校在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和贡献。

丛书第一辑共收录了 10 位名师的讲稿，讲稿的每一位作者均为学界一流的专家，内容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经济、党史、党建、文化等各个领域。

希望通过这些讲稿的公开出版，可以使更多的读者受益，在感受各位大家学理智慧的同时，承续厚重的历史，提升知识和文化涵养。

2013 年 7 月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党校复办了。1978年上半年，我踏进环境幽静、生机勃勃的校园。弹指一挥间，我在中央党校已经工作、生活了30多年。原来在高等学校主要进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到中央党校后重点转移到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现状和理论教学研究。这是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我必须进一步深入钻研马列原著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著作，进一步研究党中央的会议和熟悉党的文献，进一步开展对建国以来党在各个时期的历史、现状和理论问题的调查研究。

从我在中央党校的教学研究实践来说，在这30多年中经历了前后两个17年：前17年是1978年到1995年，集中研究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期间的中共党史和党的理论；后17年是从1995年到现在，集中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历史进程及其新鲜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讲稿，就是我在中央党校各个主体班次进行中共党史理论与实践教学记录的一个缩影。

从一定意义上说，学习研究和讲授中共党史，就是阐明党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从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就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在中共党史教学研究中，我牢记并遵循毛泽东关于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



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①毛泽东认为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与之相反的，就是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毛泽东把这种态度称之为“实事求是的态度”^②。脱离现状、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历史研究，不仅是苍白无力的，而且也无法使人们透过历史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从具体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中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规律性问题，从而得出有益的新启示、新思考；离开历史与现状的理论研究则是空洞的教条，言之无物，既没有历史感，又没有针对性的实际思考，不可能解决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问题。

所以，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研究，必须把研究历史同研究理论、研究现状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才能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借鉴历史经验，资政育人。正因为这样，做一个合格的中共党史教员，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专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积累和思考的过程，不仅要详细占有可靠的研究资料，而且要善于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还需要精心耕耘，不断进行综合分析研究。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讲稿，是出自我在党校课堂上讲授的、从党建国60多年来近百个研究专题中选出的20个专题。主要内容包括：

——阐述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创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一个东方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中国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变革。

——论述毛泽东领导党“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一系列艰辛和曲折，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科学地阐释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新鲜经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史论结合地全面描述拨乱反正中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及其经验教训。

——对建国以来党领导经济建设中的两次重大调整和十年停滞的原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因进行综合分析和评述。

——全面回顾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确立、演变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系统地总结新中国在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

——遵循完整准确的要求阐述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到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科学分析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概述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及其指导意义。

从党校学员的反映看，大家普遍认为，这些课题对党的领导干部系统学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共党史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为尊重历史，讲稿保持了原来的特点。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和条件的限制，书中不妥之处，恳请同志们给予批评指正。

DAJIANGTANG

中央党校
大讲 堂

目 录

走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1

高岗、饶漱石事件述评 /13

冒进·反冒进·批反冒进 /34

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44

党的八大的历史功绩 /62

党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严重的扩大化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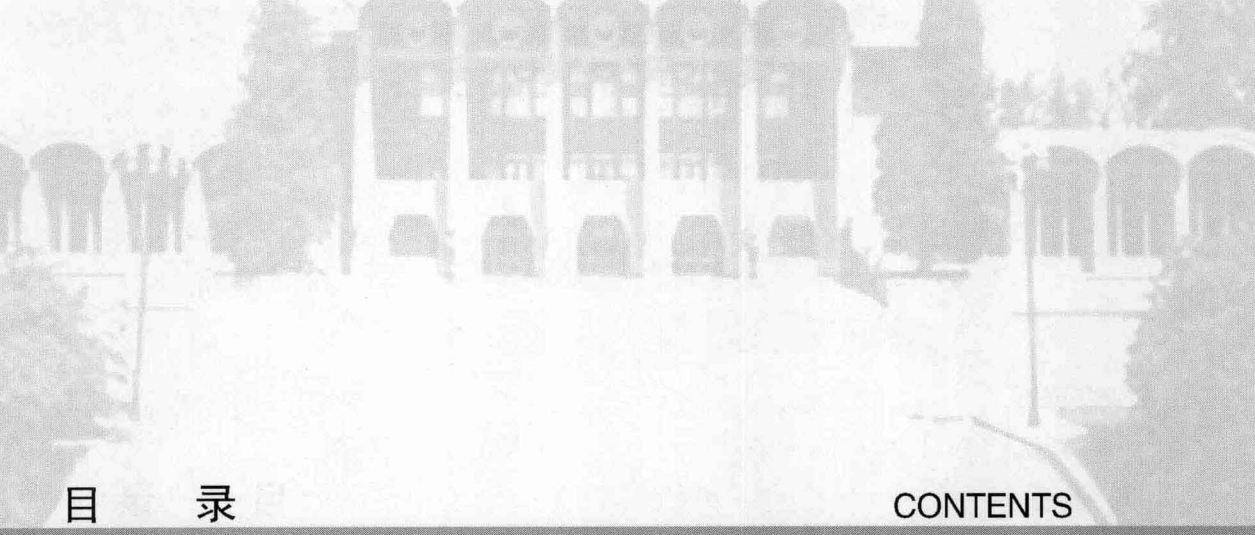
“大跃进”运动始末 /99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制定和实践 /123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的经济建设 /133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175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基本经验 /189



目 录

CONTENTS

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207
离休后的邓小平	/228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确立、演变和改革	/243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278
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概论	/295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308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338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及其指导意义	/35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研究	/373

走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总结我们党长期领导人民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换句话说，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要弄清楚这个重大问题，必须把历史、理论和现状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出正确的回答。

一、资本主义道路在近现代中国为什么走不通

经历了 3000 多年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逐步从封建社会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要使中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难以得到实现。概括来说：封建主义不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国民政府的统治和压迫，使资本主义在中国难以有更大的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选择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用毛泽东的话说，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诸多方面都无不表明，新中国成立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



能发展中国。具体来说：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障碍

中国自明末清初，江南一带已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开始萌芽。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也会逐渐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早在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所占的份额是遥遥领先于各国：中国占32.8%，英国只有1.9%，法国4%，俄国5%，美国0.1%，日本3.8%。就是在鸦片战争后的1860年，中国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英国：英国19.9%，中国19.7%，法国7.9%，俄国7%，美国7.2%，日本只有2.6%。西欧是资本主义发源地，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欧洲各国先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到1840年，英国用洋枪、大炮、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腐败的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逐步勾结西方列强，联合统治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后果：一是造成近代中国长期贫困落后，民不聊生。二是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造成严重障碍。应该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过有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例如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下，或者1914年到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各国正在火拼，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获得了某些空隙。然而，这些机遇非常短暂。特别自20世纪20年代后，在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又重新向中国加紧侵略，民族资本难以发展而走向萎缩和萧条。这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为了自身利益，成为在中国阻挠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不愿意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成为同自己竞争的对手，让中国始终是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块可以任意宰割的大肥肉；封建主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让资本主义取而代之。因此他们勾结起来，采取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的手段，压迫和抑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两面性不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向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在中国大大压倒民族资产阶级势力，中



国资产阶级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发展极不充分，发展也是畸形的，难以成为一股独立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毛泽东在 1935 年曾说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因而尽管也有革命性的一面，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作过斗争，1898 年康梁的戊戌变法，学日本，走明治维新的路，却百日夭折。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结束 3000 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孙中山为革命奋斗 40 年，然而，终于敌不过复辟势力，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支持下袁世凯称帝，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灭。中国特殊社会条件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以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不足以战胜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就无法使资本主义得到充分的发展。

（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破坏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重要原因

1927 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民族资产阶级曾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但是，为时不久，希望变为失望。1927—1937 年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大大增长，煤投资占 79%、铁 86%、生铁 80%、电力 64%，船运 63%。可见，重工业的主要部分在帝国主义手里，而民族资本的比例一再下降。官僚资本利用手中权力大肆搜刮民膏，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特别是利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的时机大发横财，靠对民族资本的排斥，挤压和吞并发展自己。外国资本、封建主义、官僚买办三管齐下，民族资本要发展实在难上加难，民族资产阶级找不到发展经济的兴旺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又出现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机遇。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那么，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也将会有所发展。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拒绝了中共正确主张并且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国共和平谈判协定，1946 年 6 月 26 日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也就行不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内战中，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则膨胀，最高额达到 200 亿美元，中国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压迫吞没民族资本的主要势力，民族资本是无法发展的。



（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定中国只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这是毛泽东在1939年5月1日《五四运动》一文所指出的科学结论。到1945年5月党的七大，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又进一步阐明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现代中国走不通的原因，总结了三个“不可能”：一是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可能。因为，这条道路已被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的18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二是建立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也是不可能。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与此相反，在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条件还不具备。现代化的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企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这自然“是完全的空想”。

这三个“不可能”，决定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必然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唯一的选择，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坚持生产力标准，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科学抉择。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产物，这完全是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得出的科学结论。

二、走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 改造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过渡时期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



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条道路的具体内容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对农业、手工业通过合作互助改造成为集体经济。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展开。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完成

农业合作化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1955 年底，这一阶段以建立初级社为中心的合作化运动，总的来说发展是健康的，但开始出现偏差。

1953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经过修改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大大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这一年是以发展互助组为主个别试办初级社为主要任务。但是，上半年就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有些地方，一下子由个别试办转入普遍试办，1—4 月初级社由 3600 多个增加到 14000 多个，增加 4 倍。中央及时发现，采取了稳妥措施加以纠正。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普遍由发展互助组、试办初级社，转入广泛建立初级社的阶段，发展相当迅速。到 1954 年 3 月达 70000 个，比原定计划 35000 个增加 1 倍。到 1954 年 6 月，由 70000 个发展到 90000 个，同年 11 月，达 12 万个。中央 10 月决定，到 1955 年春耕时高达 60 万个。1955 年 1 月已办成 48 万个，同年 4 月达 67 万个，农户 1700 万户，占全国总农户 14.2%。大办初级社是有成绩的，多数是增产的，发展基本上健康。但又由于进程过快，再次出现急躁冒进的错误。一哄而起，追求数字，强迫命令，侵犯中农利益等；加上当时粮食征购多了 70 亿斤，一时间，农村各种关系相当紧张，一些地区出现退社，大量杀猪宰羊，砍伐树木，变卖农具等。中央从 1 月到 3 月连续发出指示，整顿巩固合作社，保护耕畜，安定农民情绪等。1955 年 3 月毛泽东对邓子恢等四人谈话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了“停、缩、发”三字方针，这是符合实际的。根据这个方针，各地着手巩固整顿合作社，中央农村工作部重点帮助一些发展过快的省份



解决问题，如浙江省 1954 年办社 3800 个，1955 年初 58000 个，增加 15 倍，经过整顿，由 53000 多个退到 38000 多个，减了 15607 个，全国 2 万多个。这段巩固整顿工作是必要的，效果是好的，但是后来，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因为，在 1955 年 5 月毛泽东同邓子恢发生了一场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的争议，毛泽东认为，1956 年“要翻一番”，办社由 65 万~130 万个；邓子恢认为“只能翻半番”，100 万个。并提出他的理由：①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②根据各地反映，已办的合作社还存在不少问题，巩固工作繁重，加大发展干部能力有限，群众觉悟跟不上；③1955—1956 年是打基础的一年，做得扎实些为今后发展创造条件。以上意见是实事求是的。但由于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变化，对两次纠正合作化急躁冒进的做法不满，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左”，而是右，要加速发展。也由于对形势估计有所失误，认为农村的两极分化相当严重，要加快合作社速度。对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估计过高，当然也有理论上的一些误解，所以，1955 年 5 月以后，领导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合作化运动大大加快了。

第二阶段：1955 年底—1956 年，这一阶段以建立高级社为中心的合作化运动。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运动后期工作上出现了缺点和偏差。

在党内发生对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争论的情况下，因为急于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 年 7 月、10 月党中央先后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七届六中全会。这两次会议，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理论和政策方针基本是正确的。但在对待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和邓子恢的意见采取了错误的指责，说“他们看不见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是“无限的忧虑，数不尽是清规戒律”，掀起了一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关于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大辩论”，“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右倾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所以，尽管这两个会议对合作化运动的部署、方针政策的规定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整个精神只是一味强调反右，而右的倾向实际上又并不存在，就使运动的实际发展，离开了上述一系列正确的规定，形成了一种冒进的空气。结果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到 1956 年秋，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全国不仅完成了农业社初级化，而且



完成了高级化。原来预计要 15 年走完的路程，只 3 年多就走完了，在 3 年只有 85% 入社的农户数，又集中在最后一年里，在广大新解放区其比例则大大超过此数。这样的运动发展情况，一般是不符合毛泽东和我党历来坚持的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的方针的。特别是像这样一次伟大的全国规模的农业经济改革运动，面对的是几亿农民同盟者，更应该审慎与耐心。这次运动的结果，虽然从所有制方面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但另一方面由于：一是在新建成的农业社中，有很大部分群众入社带有很大的被迫性，违反了自愿的原则。二是党原来规定的社员的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和分期偿还的政策大都没有实行，中农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中农与贫农之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三是新发展的社一般都没有劳动组织和报酬制度，限于既定的一个模式，生产的组织和管理都比较混乱，遗留问题是很严重的。

过猛地缩短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不仅不可避免出现工作的粗糙、简单、强迫命令等现象；而且，滋长了党内已经存在的盲目性、骄傲情绪，没有仔细地觉察农民对管理上的过分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的不满，由此而打击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们陶醉在这个伟大胜利之中，没有冷静地注意到一年之内高级社化，并没有充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增长的速度逐年下降，如粮食，1955 年比上年增长 8.5%，1956 年比上年只增长 4.8%，1957 年增长只有 1.2%，我们只满足于农业总产量绝对数字的增长，而忽视年增长速度在逐年下降的趋势。

过猛地缩短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同我们党和毛泽东在一些理论上的误解有很大关系，如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长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提法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的，这种提法有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越公越纯越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在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各种经济形式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无害于社会主义，而是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合作社中采取群众创造的土地公有家庭经营的各种生产责任制也视为资本主义，党的八大有不少领导同志对此也提出了意见，但很快被“大跃进”冲掉了，没有付诸行动。又如对商品经济问题，特别忽视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953 年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是必要的，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合作化运动以后，没有调整这个政策，长时间内割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极



大地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延长了农村自然经济的统治，大大不利于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改变。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限制与反限制是主要斗争形式。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实行改造，这一政策是1953年才确定的。

实践证明，建国头三年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是正确的，使私人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恢复国民经济过程中，发挥了它对国计民生的有利方面，它由此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它是受到限制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开始实行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后，又把它纳入国家的轨道，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

直至1953年，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展，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通过收购产品，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形式，使国家基本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并使它在不同程度上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但是企业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生产、经营都是资本主义一套，因而，社会上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这同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相矛盾；还有劳资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剥削和社会主义积累之间的矛盾，等等。以上这些矛盾的发展，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国家有计划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障碍。原有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办法，这个根本办法也是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新问题”^①。照搬苏联的做法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首先，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周恩来在1952年6月19日全国统战部部长会议讲话时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②其次，必须明确社会主义的前途，要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去

①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